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Antonio Gramsci



汉阅学术文库

LETTERE DAL CARCERE

狱中书简 上册

田时纲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狱中书简 上册

LETTERE DAL CARCERE

Antonio Gramsci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田时纲 译



北京汉网传播  
Beijing Han-zeo Culture



汉 阆 学 术 文 库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GRAMSCI,LETTERE DAL CARCERE (Editrice l'Unità,Roma,1988) 译出

## 译 序

### 一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英勇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又是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1891年1月22日，葛兰西出生在撒丁岛阿莱斯镇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从小生活在屈辱、贫困之中，12岁辍学，干了两年繁重的体力活，亲身体会到社会的不平等。在高中的一篇作文中，他满怀对中华民族的深切同情，有力地谴责了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并表达了对社会革命的渴望。

1911年11月，葛兰西以优异的成绩获都灵大学奖学金，在语言系学习。由于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时常病魔缠身、头疼欲裂，但

他战胜贫病，顽强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受到教授器重。

1913年葛兰西加入社会党。1915年4月在通过大学最后一门考试后，开始职业革命家生涯。1916年至1918年，他为《前进报》、《人民呼声》撰写文章。1919年5月，葛兰西创办《新秩序》周刊；后领导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开展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受到列宁的赞扬。1921年葛兰西同陶里亚蒂等人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任意大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4年，创办《团结报》，主张北方工人同南方农民联盟反抗法西斯暴政；当选意共总书记。1925年，他为意共“三大”起草决议，清算波尔迪加机会主义路线。1926年撰写《关于南方问题的几个论题》；正当他组织反法西斯总罢工时，11月8日被捕，后被法西斯特别法庭判处20年监禁。

在狱中，葛兰西时刻关注外面的斗争。他决心把监狱当做特殊战场，继续战斗。在狱中，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他写信让亲人寄来花卉种子，种在4平方米的土地上，看它们生根、开花。受伤的麻雀飞到他的窗前，他小心翼翼地替它包扎，精心护理，使其痊愈。康复的麻雀在他手上跳来跳去，成了他的狱中伙伴。

在狱中，他从未以领袖自居，积极参加难友们成立的公共食堂的劳动：削土豆，择生菜，做兵豆汤。他把监狱当做课堂，组织政治犯文化补习学校，亲自教授历史、地理；他自己参加德语班学习。

葛兰西没有忘记法西斯检察长气急败坏的狂吼：“我们要使这个头脑20年不能工作！”1929年2月，当条件刚刚允许他工作时，他立即拟订了理论研究计划，向亲友索要所需的书籍和报刊资料。他要总结十几年的斗争经验与教训，探索马克思主义革新之路，使敌人的妄想彻底破产。

敌人的残酷迫害，狱中阴暗潮湿的环境，使他本来就很虚弱的体质更加恶化：他有时彻夜不眠，有时大口吐血，有时高烧不退。惨无人道的法西斯为了达到“慢性杀害”的目的，又不给以及时治

疗。不仅如此，敌人还阴谋利用病痛诱其变节；说只要向墨索里尼递交请求宽恕的申请书，就可获释并充任高官。葛兰西的回答是：“这是建议我自杀，然而我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但他从不做无谓的牺牲，无损于革命气节又有权要求的条件从不放弃。他申请订书订报；拥有笔、纸、墨水和单人牢房，从而在物质上保障了理论研究的进行。

像刀剑一样坚韧的葛兰西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从1929年至1935年写就一部《狱中札记》。这部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狱中札记》共计33本笔记本，长达2848页。内容丰富，思想独特，是他为自己建造的非人工所为的纪念碑。

1937年4月27日，身受法西斯残酷迫害的葛兰西突发脑出血逝世，年仅46岁。

## 二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葛兰西的威望反而更高，影响更大。主要由于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批判了苏联的官方哲学和政治体制，其实践哲学和领导权理论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

1933年至1934年，葛兰西认真研读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撰写了批判性的笔记和评论。葛兰西不同意布哈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独立的、相互封闭的概念体系加以叙述。他指出，布哈林的全部错误的根源在于“企图把实践哲学分为两部分，一是‘社会学’，二是系统哲学；离开政治历史理论的哲学只能是形而上学”。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史上的伟大成果恰恰是哲学的具体历史化及哲学与历史的同一；“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领域，才能消除任何机械论和一切迷信‘奇迹’的痕



迹”。这里，葛兰西强调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紧密结合，是把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作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把握的。

同把辩证法仅看作方法论的肤浅看法相反，葛兰西认为“辩证法是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新的哲学”。他指出，布哈林却把辩证法与政治历史理论分开，“就再不能认识辩证法的重要性与意义，就把认识论、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精髓贬低为形式逻辑的一个分支和一种入门的经院哲学”。因为，在辩证法（认识论）中，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一般概念融为有机整体。

葛兰西注意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意识和认识过程，坚决反对布哈林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仅把意识看作对物质的机械反映的形而上学观点。首先，他反对把那种“开天辟地”时的原始自然界看作认识的对象。他认为，实践不仅是人们认识的手段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而且它为自己“创造”认识对象：“只有当实在与人发生关系时，我们才能认识实在。”其次，葛兰西强调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将主体选择、需要、价值、实践结合起来考察。他认为，现象是人依靠实践和实际利益而区分的质，即根据探索世界秩序及事物分类的必要性而区分的质，不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客观的东西。总之，葛兰西反对二三十年代盛行的被动的、直观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论。他强调自然现象并非自动闯入人的感官，人是在变革自然时才与其发生关系，而实践又与人的需要、利益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象是由主体翻译的客观实在。诚然，他在表述时某些概念把握不准，给人以“矫枉过正”的印象。某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葛兰西反对列宁的反映论。但只要联系葛兰西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就会得出他是用选择论充实并完善反映论的结论。

关于实践哲学的札记，是一位身陷囹圄的共产主义战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独立思考。他不止一次地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

“实践哲学”的两个创始人。可见，“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在狱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称谓。一方面，避免引起法西斯监狱当局的注意；更主要的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独特而完整的新世界观，代表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只要这个时代没有完结，只要尚未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它就不会过时。在他看来，这个时代要延续几个世纪。

葛兰西还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受到歪曲和阉割的严重情况：“在现实中依然重现关于费尔巴哈第一个提纲中受到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立场，而且也和当时一样（虽然我们也达到更高的阶段），必须要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阶段上的综合。”一方面，为了肯定主观能动性又避免唯我论；另一方面，避免抹杀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庸俗唯物论，就必须“历史地”考察问题，并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才说：“‘一元论’这一术语表达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意味着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即与某种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变了的自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意义上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在这里，葛兰西并非主张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综合。只要我们联系他对黑格尔、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的批判，对布哈林、波尔迪加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的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正是从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反对任何一种片面倾向上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结合的。要知道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他的哲学“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从本质上看，实践哲学是一种具有意大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拉布里奥拉最早使用“实践哲学”概念的）；在20世纪30年

代特殊历史条件下，葛兰西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质，强调“回归马克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像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葛兰西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唯物主义”的误解上。他认为，“唯物主义”散发着决定论、宿命论、机械论的气味。另外，他在批判庸俗唯物主义时，对某些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有偏颇，某些不确切的表述易造成模糊唯物论和唯心论界限的印象。

葛兰西启示我们：一个政治家的真正哲学应到其政治著作中去寻找。这为我们准确把握、正确评价葛兰西的哲学思想指明了方向。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列宁主义，对葛兰西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决定性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也曾憧憬过在意大利迅速取得革命成功的美好前景。但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德、奥等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使他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西欧工业先进国家没有继十月革命之后取得胜利？

在狱中，他联系意大利和西欧的历史和现状，对这一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探索，形成了领导权理论。围绕这一理论，葛兰西形成“市民社会”概念，提出新的革命战略——“阵地战”，强调知识分子作用，突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

## 1. 市民社会

葛兰西首先考察国家的本质。他从阶级观点出发，也认为国家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统治工具。这表明葛兰西在狭义上理解的国家同列宁完全一致。但他根据西欧的特殊社会结构和新的历史情况，对列宁的国家范畴做了补充。他指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的某些成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国家是配备有强制装甲的领导权）。”显然，葛兰西扩大了国家概念的外延。在他看来，国家不仅仅是强制机关——政治社会，还是“教育”机关——市民社会。

和马克思稍有不同，葛兰西没有单从经济关系上理解市民社会，还从上层建筑上理解市民社会。葛兰西从西方社会现实出发，注意到教会、工会、社团、学校等“非政府”机构在对民众的教育和精神统一方面发挥的巨大威力，把它们称作市民社会，并同政治社会一起置于上层建筑领域。

葛兰西指出，统治阶级要维持对敌对阶级的统治，就不仅依靠暴力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而且要行使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换言之，统治阶级通过学校教育、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手段，将其世界观灌输给被统治阶级，并使它成为公众遵守的道德规范，从而获得后者对“合法”统治的认同。显然，葛兰西扩大了国家概念的内涵，他把认同提升到国家本质的高度。而当“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脱离”时，就提出了新的领导权问题，即“国家的历史基础位移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历史生活中，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是统一的，市民社会是统治阶级用非暴力手段扩大和强化其权力的领域。有人强调在市民社会中出现的领导权关系的非暴力、非强制特点，却忽视了它们仍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强化和延续统治阶级对国家控制的关系。

## 2. 阵地战

葛兰西具体考察了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而市民社会是原始和胶状的。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种正确的关系。当国家动摇时，立即出现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结构；国家仅是前沿战壕，在它后面有一系列坚固的堡垒和工事。”接着，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这种特殊结构的作用，“至于最先进国家，这里市民社会呈现非常复杂的结构，这种结构抵抗得住直接经济因素灾难性的‘侵入’——危机、萧条等，即存在对经济周期干预的手段，这里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如同现代战

争的战壕体系。就像在战壕体系中发生的一样，疯狂的炮击仿佛摧毁了敌军的整个防御体系，但仅仅破坏了外层，在冲锋时就会发现面临着还非常有效的防线。在大的经济危机时期，政治上也有类似情况。进攻部队不会由于危机而在空中闪电般地组织起来，更不会具有进攻精神。同时，守卫部队并没有士气低落或丢弃防线，即使在瓦砾之中，对自己的力量与前途也没有失去信心。”

在葛兰西看来，像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其市民社会是流动的、少层次的；工人阶级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大量的小农群众分散在农村；而沙皇国家就是一切，官僚机构庞杂，权力集中。一旦反动政权被砸烂，资产阶级政权土崩瓦解，无产阶级就可以立即成为领导和统治阶级。同东方国家相比，西方资产阶级强大得多，它们不仅拥有“前沿阵地”——反动政权，而且拥有众多的、坚固的“堡垒和战壕”——思想、文化的优势，以及学校、教会、道德观念、习惯势力等。因此，“进攻”与“防御”的关系十分复杂。所以，西方无产阶级仅仅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而且需要攻占市民社会的一切阵地。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更艰巨，所需时间更长。结论是：在西方只能打“稳扎稳打”的“阵地战”，而不能打“速战速决”的“运动战”。葛兰西借用“阵地战”和“运动战”这些军事术语，形象生动地说明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两种不同的革命战略。“阵地战”战略是领导权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阵地战就是首先粉碎资产阶级领导权，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然后才有条件夺取国家政权。葛兰西告诫西方无产阶级，更要注意开展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成为统治者之前，首先做领导者。这是葛兰西从西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经验。

### 3. 知识分子

葛兰西从领导权理论出发，对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注，也试图从全新的角度探讨知识分子及其职能问题。

葛兰西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概念，而是根据他们特殊的社会职能来探讨。为此，他对划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通常标准提出异议。他指出：“在我看来，最通行的方法论错误，在于在智力活动内部，而不是相反、在各种社会关系体系的总和中寻找区分的标准。因为这些活动（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一般总体之中。譬如，工人阶级的显著特点，并不在于它从事手工劳动，而在于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这种活动。”最后，他得出结论：“可以说，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

在葛兰西看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不是绝对的。除了分工的界限外，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发展某种智力活动，都具有一定的世界观和艺术鉴赏力。任何人类劳动都不可能排除“智力干预”。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葛兰西才说“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似乎觉得表述不够准确，举例加以修正：“同样，每个人随时都可能煎两个鸡蛋，或缝一件上衣，但不能说大家都是厨师或裁缝。”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其“特殊职业活动重心方向”为“智力劳作”，并在上层建筑中执行“领导权”的人。这样，葛兰西就把知识分子概念扩大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指在生产、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发挥组织者职能的人：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也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政府官员和政治领袖。

葛兰西接着考察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指出知识分子并不构成独立自主的阶级，而是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阶级。但他们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起着特殊的社会职能。知识分子使整个阶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同质性；他们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活细胞，他们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方面，知识分子不仅掌握宣传工具，而且肩负着在市民社会建构“意识形态结构”（如教会、教育体系、工

会、政党等)的重任。同样,在政治社会中,知识分子负责管理国家机器与军队。总之,知识分子是上层建筑的“官员”。

葛兰西在“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之间做了区分。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传统知识分子是指与旧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先进阶级为实现自己的战略总目标,就必须“同化”并在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又分为两类:一是在旧政治社会中充当官吏,行使“强制”职能的少数人;二是在旧市民社会中活动的广大知识分子。对于前者,施之以暴力或合法地“消除”;对于后者,只能在思想上征服、组织上同化,尤其对那些无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同化更为容易。应该说,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无产阶级对于传统知识分子只能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任何粗暴的、简单的、过激的政策都会有损于革命事业。至于自己培养造就的知识分子,不仅应视为本阶级的力量,而且是最积极、最先进的力量。

葛兰西还从政党角度考察知识分子作用,“政党仅是建立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方式”,“政党恰是在市民社会中执行国家在政治社会中,即在更综合更广泛的范围内执行的功能——促成统治的社会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融合”,政党“使其作为经济因素产生、发展的成员,直至成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组织者,各种活动及整个市民、政治社会有机发展固有功能的组织者”。因此,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这里,葛兰西从党建的高度看到文化建设、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确,离开先进思想的指导,精神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党就不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如果党员的文化水准不高,也很难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总之,葛兰西摒弃了依据所谓“知识分子活动本质”界定知识分子的方法,而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即知识分子活动的社会功能来考察知识分子的地位。他既肯定知识分子的阶级性,又强调知

识分子的独立性与中介性。他认为知识分子不仅应是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而且应是富有崇高理想、高尚情操和文化修养的人。

#### 4. 社会主义民主

作为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他认为，国家具有历史性，自然有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如果说国家创建初期主要作为“政治社会”存在的话，那么随着自身的发展，“市民社会”会越来越强大。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暴力和强制的因素呈逐渐减弱的趋势，而领导权和积极认同的因素逐步增强。也就是说，随着时代前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变得日益重要。

葛兰西并不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对少数人的专政，也不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创始时期实行“中央集权制”，但他不赞成将专政绝对化、扩大化，忽视了领导权和积极认同，从而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抓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葛兰西看来，中央集权制不是目的，而是产生国家生活新形式的手段；它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和唯一模式，而是像俄国那样“市民社会”不发达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模式。中央集权制对于“市民社会”发达的西方国家就不适合。正是由于葛兰西洞察了苏联中央集权制有压制民主、扼杀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严重弊病，才强调它的暂时性和可批判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应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之上，“个人和集团”的积极性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协调一致；但这是“发自内心”的积极认同，而不是靠“官员政府”强制和行政命令形成的表面的一致。葛兰西强调“至关重要的问题不是被动和间接的认同，而是积极的、直接的认同”。

同时，葛兰西并不否定法律、纪律的重要作用，但他反对用纪律取消个性、扼杀自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个性与自由问题的



提出并不是由于纪律的事实（否则，将会陷入无政府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泥坑中），而是由于支配纪律权力的存在。如果这种存在是‘民主的’……那么纪律就是民主秩序和自由的必要因素了。”

应当说葛兰西的这一思想相当深刻，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这里触及社会主义权力性质有可能改变的问题。如果执行纪律的权威代表人民的利益，纪律就是对公民自由与民主权力的保障。相反，当权威只代表少数人利益，法律和纪律就会践踏民主、扼杀自由。

葛兰西告诫执政的共产党千万不要压制历史上的新生力量：“如果一个政党努力使被剥夺权利的反动势力受到法制的约束，并把落后的群众提高到新法制的水平，那么这个党的作用就是进步的。相反，如果它企图压制历史上的有生力量，它的作用就是退步的……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意义上的民主）；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官僚主义集中制意义上的官僚）。”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东剧变后，有的西方学者乐于把葛兰西说成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民主社会主义者。实际上葛兰西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他一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平等性、排他性与局限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要由无产阶级国家取代。更重要的是，葛兰西强调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社会主义，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没有民主，也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民主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

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盛赞葛兰西实践哲学是反教条主义的典范，实践哲学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和机械化的倾向，从而回归本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更具开放性、革命性，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资产阶级思潮的挑战。今天，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批判那种把资本主义看作世界一体化基本形式的观点时，认为必须研究葛兰西的理论思想，以冲决把资本主义绝对